

讲古堂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

朱元璋

历史的惯性

朱棣

权力的奥秘

海瑞

偏执症患者

魏忠贤

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

张献忠

在劫难逃

吴三桂

无处收留

郑成功

血液里的海水

张宏杰 著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讲古堂



大明王朝的七張面孔

张宏杰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张宏杰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 (2006.12重印)

(讲古堂)

ISBN 7-5633-5743-2

I.大… II.张… III.历史人物-生平事迹-中国-明代 IV.K820.48-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0353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镇 邮政编码:101113)

开本:690mm×960mm 1/16

印张:22 字数:280千字 图片:86幅

2006年1月第1版 2006年12月第5次印刷

印数:28 001~33 000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章诒和 序

去冬，在台北读到一本英国当代著名史学家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写的《所谓的知识分子》。书中研究的对象，如卢梭、雪莱、马克思、托尔斯泰、海明威、罗素等，无一不是人们熟悉且在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作者从“人比概念更重要”的理念出发，以史料为依据对其进行重新审视，深入探究。一路读来，令人震惊——原来这些思想人物不仅是普通的人，而且还是相当卑琐的角色。比如卢梭一面鼓吹儿童教育，一面却把自己五个亲生孩子送进弃婴收容所。作者的立意显然不是恶意丑化先贤，他是希望有思想的人沿着他的叙述继续探究下去——当“知识分子”以普遍化的良心与理性代言人身份出现以来，他们是否真的就推动了时代前进？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全球教育体系扩张，原本散在民间以先民立命的‘知识分子’开始被体制所收编。‘良心知识分子’开始退位，‘政策取向的知识分子’则在专业化的名目下，成为新的主流。他们不再对政治或社会的任何事物提出不同的愿景，而只会从事各种琐碎小事的思考与钻研。其甚者，乃是在学院也日益模拟企业的情况下，大家忙着找题目领补助，忙着旅行演讲和上电视作秀。”(南方朔《从污名化里找回利齿》)是的，当明白自己身处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背景，我们才能懂得史学家保罗·约翰逊所写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其实是超越了狭义的“知识分子”角色客体，从而引导读者深入反思当代思想发展趋势的方向。在震撼中获得启示，在启示中产生联想：我们这里什么时候也能有一本类似的书？

今春在北京，我从朋友那里读到了张宏杰的历史人物另类传记手稿。作者或许没有西方学者那么明确的既是学术的也是思想的写作意向，但



张宏杰那种以正常的声音来叙述历史事件，描画历史人物的写作状态和方法，令我兴奋不已。例如他笔下的海瑞是很好的一个清官，但与此同时，还是个偏执症患者。需要说明的是，书中凡属重要人物的表现大都以史料为依据，绝非“戏说”。最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的历史随笔集《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这“七张面孔”是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监魏忠贤、清官海瑞、叛臣吴三桂、忠臣郑成功和造反者张献忠。七个人，七个侧面。这不同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一幅明王朝封建专制制度的完整图像。我想，这样的组合就很有意味，足够爱历史，爱思考的人去看，去想了。

2005年7月于北京守愚斋

丁东序

张宏杰居葫芦岛，我住北京，两地不过四小时的车程。然而，我们首次见面，居然是在大洋对岸的异国。

那是去年的初冬，我到美国东海岸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提前两天来到大学城普林斯顿，准备和一对旅居美国的中国学者伉俪同行。在他们家的客厅里，我见到一个剃光头戴眼镜的年轻人，主人介绍，是参加同一会议的张宏杰，辽宁人，学者，作家。女主人特别补充，历史随笔写得很棒。

我在国内知识界的朋友不算少，然而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当然，如今被称为作家、学者的人太多了，不知张宏杰水准如何。

我们都是第一次访美，对这片大陆的一切都感到很新鲜。承蒙主人好意，驱车带我们一起游览普林斯顿大学。这所在全美名列前茅的著名学府，已有二百五十年历史，比美国的历史还要悠久。我们一起参观了爬满常青藤的开放式校园，浏览了罗列各洲艺术珍品的校美术馆，拜访了爱因斯坦工作过的那座看起来十分普通的高级研究所。印象最深的，研究所前面竟有一片很大的原始森林。我们在爱因斯坦经常散步的这片横七竖八躺着自然死亡的巨树的森林里徜徉。那天正逢美国大选揭晓，布什胜了克里，这自然成了我们议论的话题。张宏杰话语不多，只言片语却颇有主见。后来，在学者伉俪家的餐厅，我们又屡屡讨论包括“文革”在内的中国历史，这个小伙子对历史的思考又一次给我留下印象。他对“文革”中的积极参加者，在反思批判之余，能抱有同情之理解，这在他的同龄人中是很少见到的。会议结束后，我又和他结伴游纽约，游尼亚加拉大瀑布。一路走，一路聊。知道了他曾经去韩国旅游了一次，写了一本《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在中韩两国同时出版。这次来美国，他有一个想法，想在美国打几

天工，体验一下在美华人的酸甜苦辣，回去后再写一本有关美国的书。他还真找了一位在美国的远房亲戚帮助联系，但由于他打算待在美国的时间太短，最终没有成功。通过此事，我感到这个年轻人写作的勤奋。

回国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历史随笔集。这本书，我是一口气读完的。此书文笔生动流畅，时有思想闪光。掩卷时，我已经理解了他为什么受到那对学者夫妇的器重。尤其是那位女主人，本身就是文章好手，她对宏杰，格外惺惺相惜。我对宏杰，也因这本书顿起相识恨晚之感。

后来，宏杰来北京，我们又见过几面，并把他的文章推荐给《社会科学论坛》。该刊的编辑说，刊物排印时，印刷厂的普通职工都被张宏杰的作品吸引住了，告诉他，整本刊物就数张宏杰这篇文章好看。我想，不是其他学者的文章不好，而是张宏杰的文笔更有亲和力。刊物印出后，被山东画报出版社《老照片》的执行主编冯克力看到，他马上给《社会科学论坛》主编赵虹打电话，问：张宏杰在哪里，怎么联系？这件小事，又一次证明了张宏杰文字的魅力。

今年春天，张宏杰告诉我，他又完成了几篇关于明代人物的文章，想单独编一本书，问我找哪家出版社比较好。张宏杰打算把他的新书命名为“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在书中，他描绘了大明王朝这出历史大戏里的七个不同角色：皇帝朱元璋、篡位者朱棣、太监魏忠贤、清官海瑞、叛臣吴三桂、忠臣郑成功和造反者张献忠。这七个人的画像合在一起，大致形成了大明王朝的轮廓。我把他的选题介绍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刘瑞琳女士。刘瑞琳是一位既有眼光又讲效率的编辑，看过稿子，当即表示欣赏。张宏杰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近几年的出版物也有上佳印象，于是双方一拍即合。

二十多年前，我上大学读的就是历史系。不过学的是历史，当时却热心于读小说。原因之一，是当时的历史教科书太枯燥了，看得到的史学专著也太乏味了。大多是对一些僵硬教条的解释和附会。想看有趣的书，只好到专业以外去寻找。而当时的小说，正是“伤痕文学”的高潮期，对我当然更具吸引力。后来，偶然读到了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才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原来史学著作也可以写得兴味盎然。但马上又想，能写得如此妙趣横生，由于黄仁宇是旅居美国的华人史学家，故作品可以汪洋恣肆。我们这边的学者囿于统一的思维模式，只会用同一种教训人的腔调面对读者，例外者凤毛麟角。随着思想解放的进程，史学界逐渐摆脱了教条的束

缚,恢复了反思历史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尤其是近几年,出现了吴思等一批非学院派的史坛高手。他们的出现足以证明:把历史写活,不是司马迁等古代大师的专利,也不是黄仁宇、唐德刚等海外学者的专利,身居中国内地的当代学者,也可以拥有同样的智慧和能力。

张宏杰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浮出水面的一位新人。他就读于东北财经大学,学的是投资经济管理,供职于中国建设银行葫芦岛分行。到今天为止,他的本职还是建行的一名客户经理,写作方式完全是业余。他研究历史,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纯粹是出于兴趣。未在中国的大学接受史学专业训练,倒成了他的优势。我在历史课上被灌输了满脑子格式化的教条,他却没有框框,也不受学院派行文规范的约束。他完全是用自己的心灵和直觉与古人对话,用自己的生活感受去体会古人的喜怒哀乐。他也吸收中外史学的思想成果,但杂取各家,为我所用,而非顶礼膜拜,独尊一术。西哲克罗齐有一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说到底是对过去的理解和感悟。史料的挖掘和考辨,不是张宏杰的长项,也不是他着力的重点。他的兴趣,在于以一个当代人的眼光,去感受历史人物所处的复杂环境,以“同情之理解”揣度他们隐秘的内心世界。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贼子乱臣,在张宏杰笔下,都由冰冷的史料,变成了鲜活的形象,让我们直接感受古人的智慧、权谋、无奈、残暴和血腥。吴思和我是一代人,他读史不论多么深刻与老辣,我都不会惊讶。而张宏杰今年只有三十三岁,如此年轻,品读历史的目光却如此老到,则不能不令人刮目相看。

史学的当代性,我觉得还有一层意味,就是从历史中读出现实。温故而知新,这正是读史的乐趣所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本来,古人和今人的区别,远远小于人和其他动物的区别。你可以感觉古代中国是当今中国的影子,也可以感觉当今中国是古代中国的延续。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剧烈的社会变迁,亲身体会了太多的甘苦炎凉,更容易看懂历史上的进退兴亡。这种研究历史的现实感,也有力地拉近了宏杰的文字和一般读者的心理距离。

这里不妨从张宏杰的书中试举几例:

为了减轻农民负担,中央要求各地政府发给农民“明白卡”,让农民明白自己应该负担的内容。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发明创造,早在清代就

已经想出了这个办法。这个“明白卡”在那时叫作“钱粮易知单”，“示以科则定数”，告诉百姓们上缴钱粮的定数，以防官吏蒙骗，私下多收。

这两年，全国许多地方的街头都建起了这样的宣传牌，内容是“公民基本道德规范二十字”：“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明代，各地村头街口即都建有六谕卧碑，内容是明太祖朱元璋为天下百姓规定的“道德规范二十四字”：“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

“文化大革命”时，人称毛主席语录为“宝书”，全国兴起了背毛主席语录的热潮，各地纷纷召开讲用会。早在明代，朱元璋的语录式作品《大诰》就已经成为《毛主席语录》出现前全球发行量最大的印刷品，被称颂为“臣民之至宝”。朱元璋曾命令全国人手一册《大诰》，利用一切业余时间学习：“令民间子弟于农隙之时讲读。”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下令表彰了民间学《大诰》先进分子，“命赏民间子弟能诵《大诰》者”，并举行盛况空前的“讲用大会”，“天下有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十九万余人，并赐钞遣还”。

至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迹似于曾国藩的湘军军歌，《北京的金山上》旋律取自歌颂神佛的乐曲，这种文化情性强大，有时候确乎使我自己身处何地，身在何时，感到恍然。

宏杰说，数年前，史学家戴逸教授读了他的作品，曾表示愿意做他的博导，收他做关门弟子。但他惮于学习外语要付出无谓的精力和时间，没有及时呼应。近年来，随着对历史探索的深入，这种在银行系统进行业余写作的生活方式终于使他感觉到了限制。他和我谈到过这个问题，考虑是否以考博的方式取得学院的入门资格，或许能够方便于今后的研究。

我把他的著作向两位具有博导资格的朋友推荐，他们都对宏杰的才华颇为赏识，表示愿意帮助他以这种方式进入学术界。然而，不知是由于怕学外语，还是惧怕学院式的工作方式对他的写作带来局限，他至今没有下定决心。不管张宏杰最终作何打算，我都衷心祝愿他能获得一个更自由更如意的平台，写出更好的作品。

2005年8月底

目 录

章诒和 序 1

丁 东 序 3

朱元璋:历史的惯性 1

一个坐在龙椅上的农民。他用农民式的精明、周密和愚昧打造了一个自认为固若金汤的监狱式帝国。这个监狱不但关住了老百姓,也关住了官僚,甚至还关住他的直系子孙。

更为严重的是,直到今天,中国人的头脑似乎还没有从他缔造的精神监狱中完全解脱出来。

龙爪上的泥土 / 1

初生鳞甲 / 7

炼就帝王心 / 15

龙椅上的农民 / 34

甲 均平天下 / 34

乙 构建乌托邦 / 47

丙 结网的蜘蛛 / 55

丁 思维格式化 / 72

朱棣：权力的奥秘 105

每一个篡位者都是雄心勃勃、精力充沛、充满主动出击精神的。因此，他们的出现往往会给历史带来一些血性和活力。

当然，他们弑君之后都会把手洗得干干净净，把自己打扮成一个纯洁无瑕的人。他们有充分的能力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精通权力的奥秘。

海瑞：偏执症患者 131

清官是中国贪渎文化制造出的一种病态文化现象。

从现有资料上，我们可以判断海瑞有强迫-强制型人格障碍。所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海瑞先后娶了九个老婆，和每一个都不能琴瑟相和；为什么五岁的女儿吃了男仆的一块饼，就被他活活“赐死”。

魏忠贤：一个开得过分的玩笑 169

魏进忠身躯壮大，性格开朗爽快，重感情，多少又有点没心没肺，对人没多少戒心，所以人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傻子”。

由社会最底层瞬时升到世界的制高点，这个“傻子”一时有点头晕目眩。俯视自己脚下的芸芸众生，一股大政治家的责任感油然而生。他踌躇满志，一定要励精图治，把这个帝国治理得海晏河清，让这些百姓苍生都过上幸福的生活。

张献忠：在劫难逃 199

有时他也对自己无法抑制的嗜血欲望感到不解，只能根据自己的知识范围，自我解释为身负“收人”的使命。破坏这个世界，多年来是他唯一的快乐来源。

中国历史上数千百次惨烈的农民起义，没有为这历史冲破循环状态提供任何可能。农民起义是对旧制度的一次大修和保养，而不是革命和创新。农民起义如同越狱，而每一次越狱之后新建起来的牢狱，设计得就更为科学合理，抗爆性更强。农民用

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是比以前更严密的控制,更坚固的监狱,是更好的驯化,是国民性格的进一步退化。

吴三桂:无处收留 263

第一次,他背叛了大明。第二次,他背叛了李自成。没想到,到了六十二岁白发盈巅之际,他还要第三次反叛。难道,反叛竟然是自己的宿命?

六十二岁的吴三桂渐渐明白了自己的处境,一种不祥的预感笼罩了他的心头,自己的一生有可能以彻彻底底的悲剧收场。在历史大情节中摸爬滚打了一生的吴三桂,在晚年发觉了自己一生奋斗的荒唐可笑。

郑成功:血液里的海水 303

这个异国出生的海盗之子,性格中一直燃烧着明亮的“少年性”。

郑成功的不投降,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看来,都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他这根大木,终于没有撑起明王朝的天空。然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识时务”的“俊杰”出现得太多了,这些人聪明得让人郁闷,理智得让人心灰。只有郑成功的出现,才让历史阅读者稍稍舒一口气。

后记 历史比小说更好看 336

朱元璋：历史的惯性

龙爪上的泥土

—

古今中外的帝王们中间，大明王朝开朝皇帝的出生大概最为草率了。

元帝国的糟糕统治使贫农朱五四对生育已经不感兴趣，四十七岁的他被生活折磨得完全像个老头了。他和四十二岁的陈二娘，此时已有了三男二女。在这个年岁，再怀孩子，会被人笑话，说明他俩做那件事的劲头太大。然而一不小心，还是怀上了。

朱五四夫妇已经习惯了听天由命。笑话只好由人笑话，既然怀上了，那就揣着，就好比揣个南瓜。反正装在肚子里，比衣袋里还安稳，并不妨碍陈二娘饲弄鸡猪，插秧锄草。

问题是朱家的房子，对这个即将问世的新生儿来说太局促了点。一家七口，挤在安徽凤阳东乡赵府村三间低矮的茅草房里，房顶有一处已经塌了，门也坏了多日，一直没来得及修理。一家人一年辛苦到头，到手的粮食还总是不够吃。不过五四脸上并没有愁容，他经历的大灾大难太多了，船到桥头自然直，上天既然又把一条小命派发到这个世上来，就总有养活他的办法。

蒙古人征服中原后的第四十九年，元天顺帝天历元年（1328）九月十八那天中午，陈二娘收拾好碗筷，喂完鸡鸭，挪着步子，匆匆往地里奔。正是秋播紧张的时候，一时一晌也耽误不得。走到村东头二郎庙旁边，肚子一阵阵疼了起来，这才想起，肚子里还装着个孩子呢！没办法，只好急忙拐

进破庙。刚刚迈进庙门，靠着墙壁大口大口喘气的工夫，孩子已经蠢蠢而动了。身不由己地，她顺着墙壁滑下来，刚躺到地上，孩子呱呱坠地了。

哭声十分响亮。

然而，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这个新出生的生命。这孩子在世上就像一棵野草，多他一棵不多，少他一棵也不少。他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没有任何意义。只有朱五四面临了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孩子生下来，连块裹身子的破布都没有，总不能成天这样光着啊！

幸亏二哥到河边提水时捞了一块破绸子，解了老朱家的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困难了，连名字都不用费心，亲兄弟加堂兄弟按顺序排下来，正好第八，就叫“重八”。像小猪小狗一样，自生自长起来了。什么前途、教育、事业，是些什么东西，没人费心去想。

从小到大，重八没穿过新衣服，没踩过新鞋。大人出去干活时，就拿一条索子，把他系在桌腿上，任由他在地上哭、坐、爬、吃泥土、玩自己的脚趾头。刚刚懂事，重八就成天干活，早起拾粪，白天放牛，晚上还要编草席，困得打呵欠才叫去睡觉。五四在外面老实懦弱，谁都可以欺负他，在家里却是凶神恶煞，看见哪个孩子偷懒，上去就是一顿拳脚，没好没歹。

二

二十五岁以前，朱重八对生活最深刻的感受就是：饥饿。

一年到头，朱五四一家都是以世界上最粗粝的粮食来填充胃肠。而且，即使是这最粗粝的粮食，也总是不够。那口破铁锅，只在过年过节时，才能见点荤腥。

这不是贫农朱五四一家一户的状况。这是帝国里多数农民的景象。几千年来，中华帝国一直是一只巨大的空荡荡的胃。

这个判断也许离我们头脑中的“常识”相距太远。在我们的“常识”中，中国地大物博，文化灿烂；中国人民勤劳勇敢，聪明智慧，在清朝中期以前，我们一直领先于世界。我们居然会饿了几千年？

谓予不信，请看孟子的话。周赧王十五年（公元前300年），孟轲奔走各国，大声呼吁他的政治主张。而他自视为完美的政治目标，不过是“乐岁

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用形象化的语言来夸饰他的政治理想：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这沾沾自喜的夸饰带给我们的却是一种酸楚的感觉：一个耕种“百亩之田”的“数口之家”，挣扎奋斗一生，五十岁之前却不能“衣帛”，七十岁之前不能“食肉”。这样的一生，竟然就是我们祖先梦寐以求的“王道”理想！

即使如此，这个可怜的理想很少在这片土地上实现过。中国人以聪明和勤劳闻名于世，中国的农业文明也领先了世界几千年。按理说，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应该能生活得很舒适。然而，人口压力、频繁的危害和贪婪的专制统治取消了中国人舒适生活的权利。由于中国人独特的生育观，中国的人口密度一直大于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季风性气候是一种极不稳定的气候，广袤的大地上局部灾害无年不有。中国官僚体系的庞大举世无匹，使官僚队伍吞噬了大量社会财富。这几个因素结合在一起，造成了中国独一无二的经济繁荣表象下的贫困化。饥饿和赤贫始终追随着我们的祖先，连同战乱和灾祸，从孟子的时代穿越汉唐宋明。两千年间，丰衣足食的盛世远少于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岁月。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那些慕名而来的传教士惊讶地发现，中国虽然确乎像传说中的那样地大物博，声色繁华，但民众的实际生活水平却远低于同期欧洲人。一位耶稣会传教士在致朋友的信中曾这样描述中国民众的生活：“我将告知你一事实，虽然它看似自相矛盾，但严格说来却是真实的，这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富裕、最繁荣的帝国，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最贫穷、最悲惨的一个国家。这个帝国，尽管疆域辽阔，土地肥沃，却不足以养活它的居民。要使其居民舒适，需要比其实际疆域大三倍那样面积的国土。”在这个帝国，“人们熟知，极端的悲惨驱使人们采取一些最为骇人听闻的行为。一个到中国的观光者，如果他认真观察，将不会吃惊于母亲杀死或抛弃自己的许多子女，父母为了点点钱物而出卖女儿。……街上充斥了乞丐。让人吃惊的是，最为可怕的事这里都发生了”。

三

我们得重新定义文明与财富的关系。贫穷从来不是好事。“贫困对人的尊严和人性的堕落所造成的后果是无法衡量的。”([美]查尔斯·威尔伯)贫穷遮蔽了人的眼睛,让他看不到食物以外的东西;贫穷枷锁了人的身体,让他像动物一样不停地被原始欲望折磨。贫穷剥夺了人的力量、尊严和权利,让他在自然、神灵和权力面前自觉软弱,卑躬屈膝。而财富则让人有了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关心自己的内心,关心视野以外的大千世界,思索那些与胃无关的奢侈问题。财富是文明生长的土壤。

朱重八符合苦大仇深的贫下中农的一切条件。从懂事开始,他就开始了劳动生涯,跟在娘的屁股后面拔草,和小伙伴上山打柴。十多岁开始,就去给地主放牛。从降生到这个世界上起,到十七岁以前,朱重八一步也没有离开过农村。世界在他眼里,就是从南岗到北坡之间熟悉的一草一木。他所接触过的人,不过是村子里那百十口老老少少。在这个地图上找不到的小村子里面,人们的生活与外国人描写的毫无二致:“农民的贫困和无知,使人惊讶……吃不饱饭却终日不停地劳动,三十到四十岁上就死去,是很平常的事情。做苦工是一个人从小到老的命运……他们光着身子睡在炕上,盖的是爬满虱子的破布。几乎每个儿童都长寄生虫,患有胃病、佝偻病和可怕的皮肤病。”(《延安日记》)

穷人的孩子好养活,虽然吃的是世界上最恶劣的饭食,患每个儿童都患的蛔虫病和皮肤病,并没有耽误朱重八长成魁梧的身材,只不过容貌丑了点,脑袋很长,下巴宽大,整个一张驴脸。《明史》含蓄地称他“姿貌雄杰,奇骨贯顶”。因为身强力壮,打架在行,他成了村子里的孩子王。

这个未来的皇帝最爱玩的游戏是“做皇帝”。他找个土堆一坐,让孩子们跪成一排排,整整齐齐三跪九叩,同声喊万岁。谁叩头叩得不认真,当时走下去,一脚撂倒,然后再叫边上的孩子继续打,直到打得他肯把头叩得嘣嘣响,脑门上长出大包为止。

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听四邻八乡游串的说书先生来讲书了,什么隋唐、三国、杨家将、大宋宣和遗事。在这些评书里,他知道了“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知道了朝廷之上有“忠臣”、“奸臣”,知道了“宋太祖一条哨棒,

打下四百座军州”。

在对一个人精神世界发展至关重要的青少年时期，朱重八所能接触到的外界资源太少了。史称朱元璋自小资质俊秀，“聪明过人”。《明太祖实录》载：“太后（指朱元璋的母亲）尝谓仁祖（指朱的父亲）曰：‘人言吾家当生好人。今诸子皆落落，不治产业’，指上指朱曰：‘岂在此乎？’”从朱元璋后来的表现看，这些评语并不是奉承皇帝的过誉之辞。然而，再聪明，他也不过是一个乡下孩子，如果不是元末农民大起义把他颠簸出原来的生活轨道，朱元璋注定终生被贫困牢牢锁定。在乡村社会里，不仅仅有淳朴的人情和田园风光，也有愚昧、野蛮和对权力的盲目顺从。就在社会最底层的摸爬滚打中，底层文化精神全方位地渗进朱元璋的身心。随着命运神奇的变化，登上皇位的朱元璋不可避免地把性格中的贫困文化因子更为广泛深刻地传播到整个帝国和民族精神里面。

终其一生，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的一举一动都受着农民思维方式的牢牢制约。我们在他的治国大政方针里，可以清晰地分辨出淮河南岸那个小村庄的贫困文化的精神印记。

在凤阳乡下这些农民的眼睛里，天圆地方，日升月落，小小的村野四周，景色永远不变。老一辈的生活经验对农民们有着持久的报答力。“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对于外部世界，他们的基本反应是排斥、恐惧和不信任。封闭的生活状态让他们感觉安全、轻松。

基于乡村生活经验，洪武皇帝的治国理念中表现出强烈的静态取向。他治理帝国的基本倾向就是把帝国的运转方式固定化，使整个社会倒退到“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始状态。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有具体的描述。

虽然取天下依靠的是武力、进取和冒险精神，然而一旦天下安定，朱元璋立刻恢复了农民的保守本性。大元帝国是一个世界性帝国，继承者朱元璋却对外面的世界丝毫不感兴趣。他对曾给中国带来巨大财富的海外贸易不感兴趣，不但禁绝了海外贸易，甚至禁止渔民下海捕鱼，把海岛上的居民悉数内迁，“以三日为限，后者死”。在《皇明祖训》里，他把二十多个邻国列为不征之国，以这些邻国“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告诫后代，“切记不可”对其动心思。虽然没有多少财产需要保护，套院墙在农民生活中却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物。继秦始皇之后，朱元璋的明